

权力距离与社会腐败——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饶育蕾, 何鲁, 彭叠峰, 鲍玮

(中南大学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腐败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一大难题。利用全球 62 个国家和地区的“感知清廉”指数、Hofstede “权力距离”文化价值观维度和其他相关数据,对权力距离与腐败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权力距离对腐败程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权力距离主要是通过“社会监督”途径而非“资源集中”途径对腐败产生影响。这一结论为从权力距离角度深入理解腐败产生的文化根源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 社会腐败; 权力距离; 内生性; 资源集中; 社会监督

中图分类号: C912.3; D6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7)06-0069-08

一、引言

腐败是一种利用公共职位中的权力来谋取个人私利的交易行为^[1-2]。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权力滥用引发的行贿受贿、贪污腐化一直是困扰国际社会的难题,它阻碍了社会民主和经济发展,拉大了社会收入差距,破坏了社会秩序与和谐稳定^[3]。因此,世界各国采取了各种反腐败措施。2014年,旨在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的《北京反腐败宣言》指出,腐败会破坏社会公平正义,损害政府形象和公信力,阻碍经济健康发展,是必须治理的社会“毒瘤”,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要“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在这一背景下,深刻理解腐败产生的原因,对于反腐而言十分迫切。

作为中国社会典型特点之一的高权力距离是否是社会腐败的推动因素?权力距离影响腐败的背后机制是什么?对此,本文试图寻找一个明确的答案。“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是 Hofstede^[4]提出的文化价值观维度之一,反映了一国社会对该国组织中不同等级间权力不平等的接受程度。高权力距离社会意味着人们对当权者的高度尊重和信赖。与权力距离密切相关的儒家思想利用“忠孝”来维系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和

尊卑等级架构。通过建立一套“君臣父子”的严格社会等级,儒家思想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较高的权力距离^[5]。经过儒家学说千百年的统治,较高的权力距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化特征。在这种崇尚权威的社会氛围中,权力距离对腐败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现有研究表明权力距离对社会腐败存在正向影响,但其背后的影响机制仍不清楚。许多研究使用全球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高权力距离显著提高了腐败水平^[6-8]。Akbar 和 Vujić 使用世界价值观数据也发现等级观念越强则腐败程度越大^[9]。然而,这些研究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此外,权力距离对腐败的影响机制也有待检验,这为本文留下了一定的研究空间。

本文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解决内生性问题,确认权力距离对腐败的影响,并对权力距离影响腐败的“社会监督”和“资源集中”两种可能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本文使用透明国际(TI)发布的全球清廉程度排行榜“感知清廉指数”(index of perceived corruption, IPC)来反向代理各国的感知腐败程度,用 Hofstede 的各国文化维度数据度量权力距离。研究表明,给定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高权力距离会导致更大程度的腐败。中介作用检验显示,权力距离通过“社会监督”途径而非“资源集中”途径影响腐败程度。

收稿日期: 2016-04-12; 修回日期: 2017-09-1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农村普惠金融机制: 基于社会互动的实验研究”(7167330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基于内生性社会学习机制的股票市场参与决策研究”(71301169)

作者简介: 饶育蕾(1964-), 女, 四川资中人, 博士, 中南大学商学院教授, 博导, 主要研究方向: 行为金融, 公司金融; 何鲁(1991-), 男, 四川眉山人, 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行为金融, 实验经济学; 彭叠峰(1985-), 男, 湖南娄底人, 博士, 中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实验经济学, 资产定价; 鲍玮(1989-), 女, 安徽绩溪人, 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行为金融学, 行为资产定价

本文实证结果确认了权力距离影响腐败的主要途径,弥补了当前缺乏两者间影响机制的研究的不足。此外,本文通过工具变量法解决了以前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为通过提高媒体自由度、加强社会监督降低腐败提供了实证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经济环境和社会制度是影响腐败的两大因素。研究表明,一国人均GDP可以很好地解释该国腐败水平^[10];此外,一个经济体的政府规模越大、政府介入程度越高则可能有越高的腐败水平^[11]。另一方面,高贸易开放度、高经济自由度、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等均对腐败具有抑制作用^[12-13];良好的社会制度也会通过增加社会监督、提高腐败成本而减少腐败行为,而媒体自由和公民自由则可以通过监督和曝光腐败行为抑制腐败^[14]。

社会文化也会显著影响一国的腐败水平。一国文化土壤如果有利于腐败滋生,那么人们更倾向于违反社会规范。Fisman和Miguel^[15]采用自然实验方法研究了拥有外交豁免权的他国外交人员在纽约停车场的违规行为,发现来自高腐败程度国家的外交人员更倾向于违规。直接考察文化因素与腐败之间关系的跨国实证研究发现,一国文化价值观、殖民传统、种族语言、宗教等因素可以较好地解释该国的腐败水平^[16]。因而, Park指出一国的腐败是由该国文化决定的^[17]。

权力距离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使用Hofstede文化维度数据的多数研究发现,权力距离与腐败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比如, Husted等使用全球主要国家的Hofstede文化数据和感知清廉指数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发现高权力距离显著与高腐败水平相联系^[7]。但是, Bontis利用GLOBE数据研究发现,在控制了GDP和人类发展指数(HDI)之后,权力距离对腐败的影响消失了^[18]。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使用Hofstede文化维度的相关研究并未考虑遗漏重要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造成研究结论不够准确。

高权力距离的社会常常表现出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即权力大的一方常常控制着大部分资源,有能力影响资源的分配^[19]。麻宝斌^[20]研究发现,在高权力距离文化中,权力、地位与财富往往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当权者享有特权并不断运用权力来增加财富。一般而

言,钱权交易中,当权者可以较为隐蔽地将手中权力转化为金钱。此外,部分当权者将这种行为看作权威的一种象征进一步强化了此类行为。最后,民众对权力的追求和对权威的依赖也使当权者成为社会资源的分配者^[21]。因而,权力距离越大的国家,社会稀缺资源越可能向社会顶层集中,稀缺资源的分配就越不均衡。在此情况下,社会底层对稀缺资源需求和供给的矛盾就会催生钱权交易。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底层民众不惜采用贿赂当权者的方式来获取稀缺资源,从而增大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本文将这种当权者因掌握稀缺资源而增大腐败可能性的影响机制称为“资源集中”途径。由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1和研究假设2如下。

H1: 一国权力距离越大,该国腐败程度越高。

H2: 权力距离通过“资源集中”途径正向影响腐败程度。

权力距离不仅导致稀缺资源向社会顶层集中,还使得对当权者腐败行为的监督缺位。在高权力距离社会中,当权者较少受到社会监督,从而容易滋生寻租行为,本文将其称作权力距离影响腐败的“社会监督”途径。和本文的逻辑一致,周浩认为高权力距离的管理者将上下级关系看作是不平等的,上级对下级的期待便是无条件服从上级的命令而不应该质疑或者试图改变上级的决定。因而,在高权力距离管理者看来,下属的建言(监督)行为是在挑战自己的权威^[22]。从位于企业权力金字塔下层的普通员工的角度出发,魏昕和张志学^[23]也发现中国企业员工有遵循权力距离的倾向,导致对领导者的监督缺位。这种缺位直接降低了寻租行为被查处的概率,为腐败盛行提供了条件。贝克尔的腐败威慑理论也指出,被查处概率与惩罚严厉程度的乘积决定了腐败发生的概率。因此,在高权力距离文化下,当权者更可能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进行钱权交易,腐败便成为一个高收益低成本的行为。此外,高权力距离社会中媒体往往无法自由曝光社会事件,而较低的媒体自由度和社会监督会加剧腐败^[14]。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研究假设3。

H3: 权力距离通过“社会监督”途径正向影响腐败程度。

三、数据与变量

本文使用全球62个国家和地区2004年到2013

年间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相关数据^①。权力距离(PDI)采用Hofstede对IBM公司全球员工调查得出的文化价值观数据,该数据衡量了样本国家中人们对权力分配不均的接受程度^②。使用透明国际(TI)提供的各国感知清廉指数(IPC)来反向代理腐败程度。该指数综合了多个权威机构的民意测评和调查报告,经过专家评定形成十分制的清廉指数,它反映了企业界、学者以及一般民众对国家清廉程度的主观感受,得分越高表示一国感知清廉程度越高^③;

其他相关变量中,经济环境、社会制度变量均采用十年平均值。Hofstede文化价值观变量中除权力距离之外的其他文化价值观变量包括:(1)个人主义(IDV),即个体在群体中保持个人独立或融入群体的程度;(2)阳性程度(MAS),即社会对男女平等的认同程度;(3)不确定性厌恶(UAI),即一国社会对于不确定性的容忍程度。参考Treisman和Graeff的做法,经济环境控制变量包括:(1)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一国人均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取其10年间平均值的自然对数,即LnGDP)^④。(2)经济自由度(REG),衡量了一国政策和制度对经济自由的支持程度,得分越高表示经济自由度越高,最高分为10分^⑤。(3)基尼系数(GINI),衡量一国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程度,数据也来自世界银行。参考Brunetti和周黎安^[1]的研

究,社会制度环境控制变量包括:(1)政治稳定性程度(PS),用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中的政府稳定性数据作为代理,它衡量了政府继续执政和执行计划的能力,得分越高表明一国政治越稳定,最高分为12分^⑥。(2)法治程度(Law),数据来自国家风险国际指南,衡量了法律体系的强度和公平性以及人民遵守法律的程度,得分越高表示法治程度越高,最高分为6分。(3)民主程度,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提供的政治权利(PR)和公民自由(CL)数据作为代理,得分越高代表越高的民主程度,最高分为7分^⑦。(4)媒体自由度(PF),一国中媒体报道的自由程度,数据来自自由之家,该数据取值为范围0~100,数字越大表示媒体越不自由。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样本为62个国家和地区。

表1显示,IPC、PDI、GINI和PF等主要变量存在较大的数据变异性,满足统计分析的要求。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2。可以看到,感知清廉指数与权力距离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感知清廉指数与个人主义(IDV)、人均GDP(LnGDP)、经济自由度(REG)、法治程度(Law)、政治权利(PR)、公民自由(CL)等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而感知清廉指数与不确定性厌恶(UAI)、GINI系数(GINI)、媒体自由(PF)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DI	权力距离	58.32	21.92	11.00	104.00
IPC	感知清廉程度	5.52	2.30	2.05	9.38
IDV	个人主义	44.37	24.33	6.00	91.00
MAS	阳性程度	50.55	19.92	5.00	110.00
UAI	不确定性厌恶	66.37	24.25	8.00	112.00
LnGDP	人均GDP	9.80	0.81	7.65	11.27
REG	经济自由程度	7.05	0.84	4.80	8.99
GINI	基尼系数	38.21	8.76	24.70	63.73
PS	政治稳定性	7.82	0.92	6.20	10.63
LAW	法治程度	4.17	1.33	1.66	6.00
PR	政治权利	2.05	1.57	1.00	7.00
CL	公民自由	2.17	1.36	1.00	6.00
PF	媒体自由	34.52	20.87	9.80	83.90

表2 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

	<i>PDI</i>	<i>IPC</i>	<i>MAS</i>	<i>UAI</i>	<i>IDV</i>	<i>lnGDP</i>	<i>REG</i>	<i>GINI</i>	<i>PS</i>	<i>Law</i>	<i>PR</i>	<i>CL</i>	<i>PF</i>
<i>PDI</i>	1.00												
<i>IPC</i>	-0.69*	1.00											
<i>MAS</i>	0.15	-0.20	1.00										
<i>UAI</i>	0.20	-0.26*	-0.03	1.00									
<i>IDV</i>	-0.63*	0.69*	0.11	-0.24*	1.00								
<i>lnGDP</i>	-0.56*	0.81*	-0.10	-0.11	0.67*	1.00							
<i>REG</i>	-0.41*	0.71*	0.01	-0.42*	0.58*	0.54*	1.00						
<i>GINI</i>	0.31*	-0.40*	0.08	0.02	-0.48*	-0.37*	-0.26*	1.00					
<i>PS</i>	0.09	0.16	0.02	-0.32*	0.02	0.13	0.04	0.15	1.00				
<i>Law</i>	-0.58*	0.82*	-0.19	-0.22*	0.65*	0.72*	0.55*	-0.64*	0.10	1.00			
<i>PR</i>	-0.54*	0.58*	-0.02	0.21	0.58*	0.58*	0.41*	-0.32*	-0.49*	0.42*	1.00		
<i>CL</i>	-0.58*	0.70*	-0.08	0.14	0.67*	0.69*	0.48*	-0.40*	-0.36*	0.56*	0.95*	1.00	
<i>PF</i>	0.66*	-0.73*	0.09	-0.00	-0.68*	-0.66*	-0.53*	0.48*	0.35*	-0.59*	-0.92*	-0.94*	1.00

注:表中*表示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10%的统计显著性检验

四、实证检验

本文将权力距离作为感知清廉程度的主要解释变量,在控制了其他可能的腐败影响因素后,采用 OLS 回归进行实证分析。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利用宗教和血型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之后,本文通过中介作用检验权力距离影响腐败的“资源集中”和“社会监督”两个可能途径。

(一) 计量模型

为了考察权力距离对腐败程度的影响,本文参考 Husted(1999)建立感知清廉指数与权力距离关系的回归模型^[7]。

$$IPC = \beta_0 + \beta_1 \cdot PDI + \beta_i \cdot CV + \varepsilon \quad (1)$$

其中, CV 代表控制变量集,包括除权力距离外的其他三个文化维度(IDV, MAS, UAI)、市场经济发展程度(GDP,REG)以及社会制度环境变量(PS,LAW,PR,CL)。 β_1 是 PDI 对 IPC 的回归系数,我们预期 β_1 系数符号为负。

为避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⑧,本文参考 Gorodnichenko 和 Roland 的做法,用各国主要人口所信仰的宗教和各国 A、B、O 三种血型的人口比例分别作为内生变量权力距离的工具变量^[24]。我们使用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 2010 年各国宗教分布数据,按照各国主要人口信仰的第一大宗教构造一组虚拟变量作为

权力距离的工具变量,反映信仰的变量包括新教(Protestant)、天主教(Catholic)、伊斯兰教(Muslims)、其他宗教(Other)、不信教儒家文化圈(Infidels)等 5 个变量。例如,英国大多数人信仰新教,那么新教(Protestant)变量赋值为 1,其他宗教赋值为 0。

最后,为了考察权力距离影响腐败程度的机理,本文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的经典做法对“资源集中”和“社会监督”两种途径进行中介作用检验^[25]。本文用 GINI 系数代理资源集中程度,用媒体自由度(PF)代理社会监督程度^⑨。具体来说,首先用权力距离对感知清廉程度进行回归,再用 GINI 系数、PF 分别对权力距离进行回归,最后两者一起再对感知清廉程度做回归,对应回归模型见式(2)-(6)。

$$IPC = \beta_0 + \beta_1 \cdot PDI + \beta_i \cdot CV + \varepsilon \quad (2)$$

$$PDI = \beta_0 + \beta_1 \cdot GINI + \beta_i \cdot CV + \varepsilon \quad (3)$$

$$PDI = \beta_0 + \beta_1 \cdot PF + \beta_i \cdot CV + \varepsilon \quad (4)$$

$$IPC = \beta_0 + \beta_1 \cdot PDI + \beta_2 \cdot GINI + \beta_i \cdot CV + \varepsilon \quad (5)$$

$$IPC = \beta_0 + \beta_1 \cdot PDI + \beta_2 \cdot PF + \beta_i \cdot CV + \varepsilon \quad (6)$$

(二) 结果分析

1. 权力距离对社会腐败的影响

表 3 展示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第(1)栏 PDI 的系数为负,并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该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第(2)栏控制了文化维度后, PDI 的估计系数变化较大,且仍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第(3)栏控制了经济发展变量后, PDI 对 IPC 影响仍显著($t=5.1$);

第(4)栏中控制了政治和社会民主因素后, 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第(5)栏中对前述影响因素均进行了控制, 回归结果显示 *PDI* 对 *IPC* 的影响仍然非常稳健 ($t=3.59$), *PDI* 估计系数与第(4)栏相比变化不大。

以上结果表明, 给定其他条件不变, 一国社会中权力距离越大可能产生越多的腐败, 权力距离每增加 1%, 腐败程度会提高 0.024%。考虑到观测样本数目较少可能出现小样本估计偏差, 本文使用了重复抽样的 Bootstrap 方法, 结果和 OLS 回归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以上实证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 1, 即社会权力距离越大会导致更严重的腐败。

表 3 权力距离影响腐败的 OLS 回归结果

	(1)	(2)	(3)	(4)	(5)
<i>PDI</i>	-0.071*** (-7.06)	-0.037*** (-3.10)	-0.034*** (-5.10)	-0.022*** (-2.97)	-0.024*** (-3.59)
<i>IDV</i>		0.041*** (3.76)			-0.010 (-1.37)
<i>MAS</i>		-0.022** (-2.16)			-0.007 (-1.32)
<i>UAI</i>		-0.012 (-1.47)			-0.008 (-1.44)
<i>LnGDP</i>			1.291*** (6.41)		0.477** (2.11)
<i>REG</i>			0.939*** (5.37)		0.696*** (4.05)
<i>PS</i>				0.787*** (4.77)	0.639*** (4.36)
<i>Law</i>				0.743*** (5.58)	0.403*** (3.05)
<i>PR</i>				-0.176 (-0.60)	-0.194 (-0.76)
<i>CL</i>				-0.572 (-1.66)	-0.420 (-1.35)
Constant	9.643*** (15.48)	7.805*** (6.47)	-11.700*** (-5.65)	-0.878 (-0.58)	-6.628*** (-2.75)
N	62	62	59	61	58
Adj R2	0.445	0.563	0.836	0.811	0.890

注: 括号中报告的是异方差稳健的回归系数 t 统计量; **、*、* 分别表示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 1%、5% 和 10% 的统计检验

2. 权力距离影响腐败的内生性检验

为了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使用各国主要人口所信仰的宗教和各国 A、B、O 三种血型的人口比例分别作为权力距离的工具变量。对工具变量的有

效性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发现, 两组工具变量均严格外生。表 4 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可以看到, 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 *PDI*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这一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研究假设 1。

表 4 权力距离影响腐败的 2SLS 回归结果

	<i>PDI</i>		<i>IPC</i>	
	(1)	(2)	(3)	(4)
<i>PDI</i>			-0.039*** (-2.92)	-0.062*** (-2.63)
<i>A type</i>	-24.457 (-1.45)			
<i>B type</i>	66.314** (2.29)			
<i>O type</i>	21.054** (2.04)			
<i>Protestant</i>		-7.222 (-0.75)		
<i>Catholic</i>		4.907 (0.51)		
<i>Muslims</i>		15.028 (1.00)		
<i>Other</i>		12.337 (0.98)		
<i>Infidel_confu</i>		8.231 (0.51)		
Constant	89.043* (1.83)	77.482 (1.59)	-10.960*** (-4.99)	-8.818*** (-2.64)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i>IV</i>	血型	宗教	血型	宗教
<i>N</i>	58	58	58	58
<i>R2</i>	0.5281	0.4318	0.9026	0.9077

注: (1) 第 1、2 列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第 3、4 列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2) 第 1、3 列权力距离(文化)的工具变量为血型, 而 2、4 列权力距离(文化)的工具变量为宗教; (3) 括号中报告的是异方差稳健的回归系数 t 统计量(第 1 列和第 2 列)和 z 统计量(第 3 列和第 4 列); **、*、* 分别表示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 1%、5% 和 10% 的统计检验; (4) 本表控制变量(Controls)和表 3 中控制变量相同

3. 权力距离对腐败的影响途径检验

为检验权力距离影响社会腐败的具体途径, 本文参考温忠麟, 叶宝娟的做法, 分别对“资源集中”和“社会监督”两个途径进行检验, 即分别通过表 5 中第(1)、(2)、(3)列和第(1)、(4)、(5)列检验 GINI 系数和 PF 的中介作用。

表5 权力距离影响腐败的途径检验

	(1)	(2)	(3)	(4)	(5)
	<i>IPC</i>	<i>GINI</i>	<i>IPC</i>	<i>PF</i>	<i>IPC</i>
<i>PDI</i>	-0.027*** (-4.658)	-0.078 (-1.425)	-0.025*** (-4.342)	0.176** (2.041)	-0.020*** (-3.915)
<i>GINI</i>			0.015 (1.195)		
<i>PF</i>					-0.036*** (-3.355)
<i>UAI</i>	-0.003 (-0.483)	-0.047 (-1.337)	-0.002 (-0.364)	-0.124 (-1.655)	-0.007 (-1.327)
<i>lnGDP</i>	0.627** (2.613)	2.173 (1.005)	0.594** (2.407)	-1.045 (-0.315)	0.590*** (2.772)
<i>REG</i>	0.807*** (4.103)	-0.250 (-0.194)	0.810*** (4.217)	-3.631* (-1.972)	0.677*** (3.618)
<i>PS</i>	0.558*** (3.282)	1.666 (1.499)	0.533*** (3.127)	3.651 (1.526)	0.689*** (4.101)
<i>Law</i>	0.410** (2.443)	-5.413*** (-3.801)	0.491*** (2.817)	-1.678 (-1.038)	0.350** (2.271)
<i>PR</i>	0.162 (0.597)	1.341 (0.722)	0.142 (0.519)	1.193 (0.341)	0.205 (0.885)
<i>CL</i>	0.258 (0.770)	-1.441 (-0.540)	0.280 (0.827)	-8.207** (-2.179)	-0.036 (-0.117)
<i>Constant</i>	-12.093*** (-6.519)	39.825** (2.155)	-12.693*** (-6.783)	88.586*** (3.630)	-8.926*** (-4.223)
<i>N</i>	58	58	58	58	58
<i>Adj R²</i>	0.890	0.425	0.889	0.840	0.904

注：(1)括号中报告的是异方差稳健的回归系数 *t* 统计量；(2)***、**、*分别表示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 1%、5%和 10%的统计检验

如果“资源集中”途径成立，那么 *GINI* 系数的对权力距离与腐败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显著，即(1)、(2)列中 *PDI* 的系数应当在统计上显著。但表 5 第(2)列结果显示，*PDI* 的系数小于 0，说明权力距离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但是这一系数并不显著，表明 *GINI* 系数并非权力距离影响腐败的中介变量，因而否定了研究假设 2。可见，“资源集中”途径不是权力距离影响腐败程度的主要机制。对于“社会监督”途径，表中第(1)、(4)、(5)结果显示，第(4)列中 *PDI*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第(5)列中 *PDI* 和 *PF*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媒体自由 *PF* 对权力距离与腐败之间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此外，第(1)列中 *PDI* 的系数绝对值比第(5)列中更大也侧面印证了 *PF* 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这与研究假设 3 一致，即权力距离会导致社会监督减少，从而增大社会腐败。

五、结论

为了探究一国权力距离是否对该国腐败程度存在影响以及其影响途径，本文用全球 62 个国家和地区的感知清廉指数、权力距离等相关数据，首先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而对“资源集中”和“社会监督”两个可能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1) 在控制了其他文化、经济和社会制度因素后，一国社会中的权力距离与腐败程度正相关。

(2) 使用各国宗教和血型分布构建权力距离的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进一步表明权力距离增大引起更严重的腐败。

(3) 权力距离并非通过“资源集中”途径影响腐

败程度, 而是通过“社会监督”途径对腐败产生影响。

结合我国社会文化来看, 权力距离对腐败产生影响十分符合直觉。在儒家文化传统下, 高权力距离是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一大特点。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中, 当权者往往掌握较多的社会稀缺资源, 普通民众对权威的崇拜敬畏也使得当权者很少受到社会监督。当从正常途径无法获得稀缺资源或者成本过高的情况下, 普通民众只能选择采用贿赂当权者等不正当方式。换句话说, 稀缺资源的错配为钱权交易提供了土壤, 增大了掌权者腐败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在其他高权力距离国家也普遍适用。

从实证结果来看, 对当权者的监督缺位是高权力距离导致高社会腐败的主要原因, 而权力距离并不通过资源向当权者集中这一机制影响腐败。可见, 当权者掌握一定的稀缺资源是权力寻租的基础条件, 但不一定必然导致腐败。只有当掌握稀缺资源的权力缺乏监督时, 高收益低成本的寻租行为才会迅速滋生。在我国社会环境下, 高权力距离带来社会监督缺位正好为腐败行为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是腐败频发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从权力距离视角制定反腐政策提供了实证证据和新的思路。在当前我国现实情况下, 组织中下属往往对上级当权者言听计从, 存在明显的层级关系。即使下属知道上级有腐败行为, 也不会主动揭发, 社会监督无从谈起。龙朝阳和田银华也指出, 加大惩罚或者提高薪酬激励无法遏制腐败, 优化社会监督环境才是预防腐败的关键^[26]。因而, 应当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 真正把权力关进社会监督的笼子里。

必须指出的是, 文中所用的感知清廉指数是对清廉程度的一种主观评判, 用来作为腐败程度的反向代理变量还不够客观。此外, 各国的文化价值观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发展变化, 但 Hofstede 文化维度数据却并非每年更新。在今后的研究中, 需要寻找更有效的数据来代理腐败程度和权力距离。

注释:

- ① 由于数据可得性问题, 实证数据只更新到 2013 年。所有数据均采用十年均值, 因此未更新最新数据对结果影响不大。
- ② 参见 2010 年 Hofstede 出版的书籍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its importance for survival*。由于数据限制, 我们只使用了 62 个国家和地区的 4 个文化价值观维度数据。
- ③ 在 2012 年 IPC 报告中民意测验和调查报告包括: 国际民意测验组织(GALLUP)发布的《年度调查报告》、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报

告》等 13 个报告, 该指数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腐败度量指标之一。

- ④ 世界银行: <http://www.worldbank.org>。
- ⑤ 菲沙研究所: <http://www.fraserinstitute.org>。
- ⑥ 国家风险国际指南: <http://epub.prsgroup.com/products/icrg>。
- ⑦ 自由之家: <http://www.freedomhouse.org>。
- ⑧ 导致内生性问题可能原因包括: (1) 主要变量 IPC 和 PDI 可能存在一定的测量误差; (2) 回归模型中可能存在遗漏重要解释变量的可能。
- ⑨ 媒体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 腐败行为的揭露者往往是社交媒体。

参考文献:

- [1] Aidt T S. conomic analysis of corruption: A survey[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3, 113(491): F632-F652.
- [2] Jain A K. orruption: A review[J].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01,15(1): 71-121.
- [3] Bardhan P.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issue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7, 35(3): 1320-1346.
- [4]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M]. Sage, 1984.
- [5] Dalton B M. Corruption in cultural context: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Korean tradition[J].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2005,43(4): 237-262.
- [6] Park H. Determinants of corruption: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J]. *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3, 11(2): 29-48.
- [7] Husted B W. The impa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software piracy[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0, 26(3): 197-211.
- [8] Davis J H, Ruhe J A. Perceptions of country corruption: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3, 43(4): 275-288.
- [9] H. Akbar Y, Vujic V. Explaining corruption: The role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J].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2014, 21(2): 191-218.
- [10]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et al.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99,15(1): 222-279.
- [11] 周黎安, 陶婧. 政府规模, 市场化与地区腐败问题研究[J]. *经济研究*, 2009(1): 57-69.
- [12] AdesA, DiTella R. Rents, competition, and corrup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89(4): 982-993.
- [13] Graeff P, Mehlkop G. The impact of economic freedom on corruption: Different patterns for rich and poor countries[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3, 19(3): 605-620.
- [14] Brunetti A, Weder B. A free press is bad news for corruption[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3, 87(7): 1801-1824.
- [15] Fisman R, Miguel E. Corruption, norms, and legal enforcement: Evidence from diplomatic parking ticket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7, 115(6): 1020-1048.
- [16] Treisman D.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a cross-national study[J].

-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0,76(3): 399-457.
- [17] Park H. Determinants of corruption: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J]. *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3, 11(2): 29-48.
- [18] Bontis N, Bart C, Seleim A,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corruption: A cross-national study[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2009, 10(1): 165-184.
- [19] 李雪灵, 张惺, 刘钊, 等. 制度环境与寻租活动: 源于世界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2(11): 84-96.
- [20] 麻宝斌. 中国行政文化: 特征, 根源与变革[J]. *行政论坛*, 2013(5): 42-48.
- [21] 杨明海, 冯玉静. 权力距离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研究[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12(3): 61-65.
- [22] 周浩. 管理者权力对采纳建言的影响: 管理者自我效能与权力距离的作用[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3): 123-131.
- [23] 魏昕, 张志学. 组织中为什么缺乏抑制性进言?[J]. *管理世界*, 2010(10): 99-109.
- [24] Gorodnichenko Y, Roland G. Culture, institution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J].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0.
- [25]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5): 731-745.
- [26] 龙朝阳, 田银华. 腐败行为及其治理选择——基于前景理论的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08(4): 46-52.

Power distance and corrup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ransnational data

RAO Yulei, HE Lu, PENG Diefeng, BAO Wei

(School of Busines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Corruption is a severe problem currently fac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Using the index of “perception corruption,”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Hofstede’s “power distance” and other relevant data from 62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is empirical study finds that higher power distance will lead to greater degree of corruption. Using two-stage least squares method to solve the endogenous problem, conclusion still holds.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impact of power distance on corruption is mainly through the “social supervision” rather than “resource concentration” approach.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roots of corruption and taking appropriate measures against it.

Key Words: corruption; power distance; endogeneity; resource concentration; social supervision

[编辑: 谭晓萍]